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年5月13日)

1、《国家利益》刊文分析拜登政府对韩政策

5月11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了青年外交政策专家组织(YFPF)亚太地区研究员詹姆斯·帕克(James Park)撰写的文章《拜登不应以向首尔施压的方式促使其“战略清晰”》。文章称,韩国文在寅政府正通过“战略模糊”在美中之间开展平衡外交。美国对韩单方面施压并不足以使其改变策略,因为韩国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难以离开中国。文章回顾了美朝河内首脑会谈破裂以及中国在朝核问题方面作用不断加强的历史,指出文在寅政府已将摆脱半岛僵局列为重要目标,明确反对中国只能阻碍这一政策进程。文章认为,尽管韩国的平衡外交将受到美中战略竞争态势的冲击,并且明确加入“四国对话机制”(Quad)也能为韩国带来相关优势,但代价则是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受阻,并失去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支持,甚至促使中俄朝建立伙伴关系以平衡美日韩三角关系。文章称,为使韩国转向“战略清晰”,拜登政府须打消韩国上述顾虑,改变当前等待朝鲜自愿返回谈判的被动政策,最大程度同朝鲜接触以增强美国外交主动性,抵消中国影响力。美国可为恢复

美朝对话作出早期让步，通过提供疫苗援助、减少美韩军事行动、任命美朝和谈特使等方式获取朝鲜信任，引导朝鲜重回核军控谈判并签署相关协议，逐步构建全面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此举即减少韩国对中国依赖的最佳方案。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korea-watch/biden-shouldn%E2%80%99t-pressure-seoul-%E2%80%98strategic-clarity%E2%80%99-184936>

撰稿人：王乐瞳

2、《外交政策》刊文分析如何促进美印关系发展

5月11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印裔美国人组织 Indiaspora 高级项目主管阿曼·塔克（Aman Thakker）撰写的文章《如何促进美国最重要的伙伴关系》。文章称，拜登政府重视加强美印关系，然而，从两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势头到美国未对印度疫情作出及时反应的事态转变，也给美印关系发展带来重要挑战。文章回顾了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印在官员互访、对抗中国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取得的良好成就，同时也具体指出了美印在贸易领域以及应对印度疫情方面产生的分歧。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已将印度和“印太地区”视作外交优先方向，且美印在战略与安全层面拥有一致性，因而美印关系将继续发展。但上述领域的分歧也警示美印政府，必须平衡两国具有竞争利益的领域，克服疑虑，追求长期目标。两国可协作应对三个重要挑战：第一，在阿富汗撤军方面，印度需理解拜

登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及其战略调整，而美国也应重视印度在维护阿富汗和平、限制巴基斯坦方面的关切；第二，在美印贸易分歧方面，两国应承诺迅速完成悬而未决的贸易协定，并加强高新技术合作；第三，在印度采购俄制武器方面，美国需适当克制，认清本国在“印太地区”的长期战略利益以及印度的大国平衡目标。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11/india-united-states-partnership-biden-coronavirus-afghanistan/>

撰稿人：王乐瞳

3、《国家利益》：拜登政府不应同时对抗中俄

5月11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了卡德学院安全研究高级研究员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撰写的文章《拜登政府未能设定出明智的外交政策重点》。文章称，拜登政府同时对中俄两国实施强硬政策的做法并不明智，也有违基辛格关于美国要防止中俄走近的战略原则。文章从三个层面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回顾：在总体层面，美国不仅正在同时对抗中俄两个大国，而且在中东等其他地区的实质性战略投入仍在增长，相关举措将使美国陷入过度扩张和战略透支的风险；在对俄政策层面，拜登政府及民主党把俄罗斯视作党派斗争工具和美国的“生存威胁”，并不断增加美俄对抗趋势；在对中政策层面，拜登政府在经贸、安全等领域继续对中国奉行强硬路线，相关举措并不比特朗普政府时期明智。文章称，拜

登政府模糊的外交政策重点和战略短视正在加速中俄全方位合作的进程。鉴于中国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和常规军事力量，拜登政府当前最为明智的做法是修复美俄关系，防止中俄走近，以使美国能够专注于对中国的战略竞争。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biden-administration-failing-set-intelligent-foreign-policy-priorities-184926>

撰稿人：王乐瞳

4、《纽约时报》刊文分析当前巴以冲突形势

5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其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文章《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他们的邻国担心这是否是一场大规模冲突的开始》。文章认为，近期在耶路撒冷发生随后蔓延至加沙地带的暴力活动不会成为巴以大规模冲突的开始。因为相关各方都不愿看到冲突升级：以色列将难以得到偏左倾拜登政府的支持；阿拉伯国家希望和以色列进行生意往来，而不希望为了捍卫巴勒斯坦人民而陷入泥潭；巴勒斯坦当局则担心自己无法控制巴勒斯坦的民众。这一轮巴以冲突源于巴以对于圣城耶路撒冷由来已久的争夺，以及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日与穆斯林的贵夜两个神圣节日的时间偶合，圣地与圣日的冲突结合致此。此外，TikTok 也为以视频方式传播巴以仇恨提供了平台。文章指出，近年以色列国内逐渐形成共识，认为其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已常态化，巴以和平也不再成为以大选的核心议题，这种对巴立场是幼稚且危险的。特朗

普政府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在为阿以带来和平的同时也造成了和平假象；而拜登政府当前的优先事项在于重启伊核协议而不是应对巴以问题。此外，内塔尼亚胡很可能利用当前巴以冲突局势来维护自身政治安全。文章最后指出，如果相关各方能够明白掌控民意符合自身的利益，局势就能降温；若此次冲突发展为自下而上的动乱，各当局将面临巨大挑战。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11/opinion/jerusalem-rockets-israel.html>

撰稿人：陈晖博

5、《外交政策》：特朗普之后，脸书应关注莫迪

5月10日，《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登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全球商业系主任巴斯卡尔·查克拉沃尔蒂（Bhaskar Chakravorti）文章《特朗普之后，脸书应关注莫迪》。文章指出，除了脸书对特朗普的“禁令”外，人们应当关注其他更多领导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如印度的莫迪。莫迪的民众影响力巨大，今年3月数万名观众聚集在以莫迪名字命名的体育场观看板球比赛，莫迪政府为了彰显其影响力而没有管控疫情期间本应限制的观众人数。在莫迪引领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下，印度的民主面临威胁。中央政府的失职导致印度疫情再次暴发，给印度民众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且严重损害印度国家形象。莫迪在脸书上发布的选举集会视频强化了回到拥挤的公共场所是安全的

这一错误观念。此外，莫迪还称自己战胜了疫情并“鼓舞”了世界。印度民众因卫生体系的失败而遭受生命威胁的同时，莫迪却在社交媒体上营造虚假的安全感。政府甚至命令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删除批评其应对新一波疫情并要求莫迪辞职的内容。当然，莫迪在社交媒体上的此类行为不属于传统的错误信息或煽动叛乱的范畴，但它们仍具有致命后果。监管这类政治内容对脸书而言是困难的。要避免这些内容的潜在危害，脸书需要组织专人评估诸如莫迪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言论的社会后果，确保他们的言论不会造成巨大的负面社会后果。此类内容监管当然会带来巨大政治争议，但脸书必须担起这一责任。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10/modi-facebook-supreme-court-trump-super-influencer/>

撰稿人：陈晖博

6、大西洋理事会：美国撤军后在阿富汗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5月11日，大西洋理事会在其网站发表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詹姆斯·库宁哈姆（James B. Cunningham）和厄尔·安东尼·韦恩（Earl Anthony Wayne）合撰的文章《阿富汗：现在该如何避免灾难？》。文章指出，美国和北约军队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已经无法改变，现在重要的不是争论这个决定是否合理，而是应该考虑美国当下需要做什么。对美国来说，其在阿富汗仍有需要维护的利益，包括：有效应对潜在恐怖主义威胁和继续推行妇女权利、言论自由、

选举公正等美国及其盟友所拥护的价值观。因此，拜登政府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在阿富汗维持连贯政策。第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明确表示支持阿富汗的宪法秩序，其中关键的两步将是邀请阿富汗总统访美以及停止向塔利班进行单方面的让步；第二，美国还必须在实践上表明其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ANDSF）的支持，在未来几年做出明确和公开的资金承诺；第三，美国必须制定可行的计划，帮助维持阿富汗政府的基本服务运行，支持民间社会组织并满足基本的人道主义需求。总之，美国的单边外交应该加大力度，与此同时，也要加强与联合国和盟友的合作，以推动和平进程。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afghanistan-what-now-to-avoid-disaster/>

撰稿人：聂未希

7、《报业辛迪加》：全球应当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合作

5月11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了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法比奥·帕内塔（Fabio Panetta）的评论文章《可持续金融全球协议》。文章称，大国气候承诺和多边主义的恢复为全球在碳定价、绿色转型和可持续金融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创造了机会，而欧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理想模式。文章表示，在国际议程中，有三个关于气候合作的优先事项非常突出：第一个是需要提高全球碳价格，这是以必要的规模和速度减少排放的最具效益的方式。第二个是利用疫情恢复的机会，塑造未来

几十年的气候轨迹，政策制定者应使全球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第三个是金融系统和中央银行应为绿色转型提供资金，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需要大量的投资。文章表示，由于缺乏全球协调，可持续金融市场效率极低，限制了绿色投资资本的跨境供应，监管套利和竞相压价的风险已经增加。文章指出，为建立全球合作体制，第一步应当就企业信息披露的最低标准达成一致。二是确保各国对可持续投资有一致的定义和分类。三是确保金融活动与更广泛的气候目标保持一致，减少金融活动所带来的巨大能源消耗和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ustainable-finance-global-taxonomy-agreement-by-fabio-panetta-2021-05>

撰稿人：凌邦皓

8、《报业辛迪加》：提高生产力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不确定性

5月10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评论文章《生产力革命会推迟吗？》。文章称，在劳动力数量缓慢增长且已经存在巨大资本存量的发达经济体中，生产力通常会占据产出增长的一大部分。这意味着提高生产力是改善经济表现的最直接快捷方式。历史上存在的新经济时代就是这一增长方式的较好体现，即批发、零售和金融领域都采用了创新数字流程。但是现在却一直无法复制新经济时代的快速生产力增长。对于当前新冠疫情的影响，文章认为，麦肯锡公司这类乐观主义者

认为远程工作的兴起证明企业正在更高效地组织自身业务。但同时也存在另一些更令人担忧的趋势：对数字技术的投资都集中在了大企业，小企业正在被抛离，而大企业所享有的更强大主导地位则意味着更少的竞争以及更小的市场领导者创新压力。文章称，科学进步是人们保持乐观的最根本原因，但这些进展很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在生产率统计中展现出来。当前，美国总统拜登显然也押宝在了更快的生产率增长上，而削减基础设施支出的做法显然适得其反，这只会导致生产率增长的前景在短期内出现恶化；削减儿童早期教育支出也是如此，因为这将损害长期前景。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andemic-technology-delayed-effect-on-productivity-by-barry-eichengreen-2021-05>

撰稿人：凌邦皓

9、AEI：哈马斯和伊朗正对以色列施加经济消耗战

5月1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在其网站发表该智库常驻研究员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的文章《哈马斯火箭弹和伊朗无人驾驶飞机：对以色列的经济消耗战？》。文章指出，5月10日夜间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防空部队使用“铁穹”防空导弹进行拦截。尽管以色列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的火箭弹而显得在对抗中占据上风，但其可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发射和拦截的成本并不相同，哈马斯可以以很少的成本使以色列消耗数千万美元。与此同时，伊朗无人机队的质量和数量快速增长。将

两者结合起来，以色列将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铁穹”可能难以击败蜂拥而至的低空飞行无人机，再加上经济消耗战，在导弹和无人机方面相对较少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以色列耗尽反导防御武器库，并削弱其蓬勃发展的经济。因此，如果以色列打算抵抗哈马斯导弹以及伊朗无人机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主动防御尚不足够，它必须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

<https://www.aei.org/op-eds/hamas-rockets-and-iranian-drones-a-war-of-economic-attrition-against-israel/>

撰稿人：聂未希

10、ECFR：德国需采取更具雄心的气候行动

5月11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在其网站发表研究员朱尔·科内克（Jule Könneke）和拉斐尔·洛斯（Rafael Loss）合撰的文章《德国如何再次成为气候领导者》。文章指出，德国宪法法院近期废除了部分2019年通过的《气候保护法》。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宪法法院认为，该法案设定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却只规定了到2030年的具体实施步骤，将不必要的负担转移给了后代，有违代际公正。法院主张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止未来出现不可接受的“彻底节制”限制。这一做法暴露了政治家关注任内短期成果与气候危机带来的长期挑战之间的矛盾。尽管德国宪法法院并非首个做出类似裁决的欧洲法院，但这是默克尔挽救其气候遗产的最后机会，力争在欧盟层面

实现对“欧洲绿色协议”的全面支持。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取决于欧盟自身的气候政策改革能否顺利通过。欧盟拟于今年 7 月宣布气候变化一揽子改革计划，包括到 2030 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 年水平降低 55%。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德国能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显示出可信的全球领导力，如提高气候融资规模、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等。

<https://ecfr.eu/article/out-of-order-how-germany-can-become-a-climate-leader-once-more/>

撰稿人：聂未希

撰稿人：陈晖博、凌邦皓、聂未希、王乐瞳

审稿人：贺刚、杨舒涵